

歸有光



散文选集

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归有光散文选集

张家英 徐治嫻 选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归有光散文选集/张家英, 徐治娴选注.—3 版.
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百花散文书系. 古代部分)
ISBN 978—7—5306—5405—7

I . 归... II . ①张...②徐... III. 古典散文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 264.8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630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875 插页 2 字数 218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,根深叶茂。它和诗歌一样,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,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,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,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,特编辑这套“中国古代散文丛书”,作为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。

二、散文文体范围,代有嬗变,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,以抒情、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,下迄于清代。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,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,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、演变轨迹。

三、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:一为论文,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、文学活动外,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,分析、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、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。一为散文,每篇均附加题解、注释。

四、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,以论文帮助

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,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,两相印证,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,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,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,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。

五、每书所选散文,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,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题材、风格的文学性散文,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。

六、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、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、出处、版本等外,还对作品写作背景、思想价值、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,加以简明的评述。

七、注释以疏解难字、难词以及典故、职官、器物、人名、地名等为主。对其重要者、用法特殊者,并援引出处或例句,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归有光和他的散文

张家英 徐治娴

一

归有光,字熙甫,早年自号项脊生,后改号震川,学者称为震川先生,昆山(今属江苏省)人。生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(1507年1月6日),卒于明穆宗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(1571年2月7日),享年六十六岁。

归氏为吴中一大族姓。其定居昆山的一支,无人在朝中任职。归有光的曾祖归凤,曾中成化十年(1474)举人,担任过兖州城武(今山东省成武县)知县。祖父和父亲都只是县学生员,未曾出仕。他出生时,家道已经中落了。

归有光五、六岁时开始读书,九岁能文,十岁已能写出成篇的制艺文字《乞醯》(本文所举归有光文,凡见于《震川先生集》者,均不加注)。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,二十岁补苏

州府学生员,名列第一。此后,曾在苏州府学读书数年,又曾与同学结为文社,读书论文于马鞍山(在昆山县西北)中。三十五岁中南京乡试,本应第一而列为第二(参见王锡爵《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》,《震川先生集》附录)。从第二年起,他每三年一次,到北京去参加会试,结果是八上春官,均不第。

嘉靖二十年(1541),归有光三十六岁。他卜居于嘉定安亭,此后即开始了二十多年的授徒生涯。由于他颇有名气,来跟他学习的多至数百人。这段期间,他除了授徒外,还有以下几件事值得一说。

一、创作大量散文。《震川先生集》中所收 605 篇散文,写作年代可考者在半数以上,其中作于此一时期的约 180 篇。另有一些写作年代虽不可确考,而写作时间可大致推定的作品,也大多作于此一时期。

二、撰写经史著述。据《明史·艺文一》载:其说经之作有《洪范传》、《考定武成》、《孝经叙录》各一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另著录其《易经渊旨》一卷(《四库全书总目·经部·易类存目》)。这些都是为他授徒和应试所必需的。

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皆成于元,或繁或缺,明人多欲为之重修(赵翼:《二十二史札记》卷二十三《宋辽金三史重修》条),归有光亦曾立下过这种宏愿(参见《与陆太常书》、《与赵子举书》、《与王子敬》等)。今《震川先生集》中尚存有《宋史论赞》一卷,即是遗留的痕迹(《明史·艺文二》另载归有光有《读史纂言》十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未收)。

三、关心社会问题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归有光生活的大湖、吴淞江流域,水患颇多。明初虽

屡加疏浚,问题并未解决(《明史·河渠六》)。他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,除写有《水利论》等论文外,另辑有《东吴水利录》四卷(《明史·艺文二》)。清代人认为:“言苏、松水利者,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·地理类二》)

倭寇骚扰沿海,是嘉靖年间江浙地区面临的一大问题。为此,明代政府曾于吴淞江入海处增设金山卫,指挥官先是参将级,后升为副总兵级,并抽调附近各省区兵力,前来备倭(《明史·兵三》)。嘉靖三十一年(1552),倭寇入侵江浙地区,烧杀淫掠,为害惨剧。归有光潜心研究,除写有记事性散文外,还写有讨论备倭战略的论文,《论御倭书》即其中之一。

当年江浙地区赋役严重:“亩税有二、三石者。大抵苏最重,松、嘉、湖次之、常、杭又次之。”(《明史·食货二》)归氏曾向有关当局进言,希望采取措施,减轻人民负担。在他给离职地方官和担任地方官的同年所写的赠送序中,多次提及此一问题,表现了他的特殊关切。此外,他为家乡弱女子张贞女被害一事奔走呼号,要求伸张正义,也是他关心社会问题的表现之一。

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归有光六十岁。这一年,他第九次到北京应试,中三甲进士。按照惯例,他先分到工部都水司试用,然后到吏部听候差遣。选授给他的官职是浙江长兴知县,官阶正七品。

隆庆四年(1570)春,归有光自邢州任上入贺京师,为太仆寺留修寺志。他的会试座主高拱与他所景仰的赵贞吉,当时都官内阁大学士,经他们推荐,归有光升任南京

太仆寺丞,官阶正六品。南京的官銜本为闲职,于是被留在北京内阁制敕房,先是草拟敕命,后专修《世宗实录》,这可算是他仕途顺利的短暂时期。不料浙江的监察御史仍要找他的岔子。得知这一消息,他悲愤交加。由于承受不了这种精神打击,遂于第二年正月十三日(1571年2月7日)郁郁不乐地离开了人世(参见王世贞:《归太仆赞》、《震川先生集》附录)。

二

从少年时代起,归有光接受的就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。后来授徒时,他要求学生读圣人之书,称述圣人之道,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事(见《山舍示学者》),灌输的仍是正统儒家思想。虽然他爱读《老》、《庄》,也曾尽见五千四十八卷《大藏经》,并于“《妙法莲华经》、《维摩诘》诸上品,皆略究其大旨”(《赠菩提寺坤上人序》),但从思想的主导方面考察,他仍是一个正统的儒生。这样,他的散文中不可能不掺杂着忠孝节义一类的封建伦理思想。但他的思想中也有若干闪光的因素。

他写过一篇短文《言解》。在这篇短文中,他把“终日而谈道”与“终日而谈鬼”相提并论,予以批判。虽然孔子指责过“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的行为,但在道学势力颇大的时代,敢于将“谈道”比为“谈鬼”,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。

他写过一篇《贞女论》。文章开头提出:

女未嫁人，而或为其夫死，又有终身不改适者，非礼也。

接着引来作为论据的，主要是《礼记·曾子问》中孔子与曾子的两段对话，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。接着便说：

阴阳配偶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。终身不违，是乖阴阳之气，而伤天地之和也。

所谓“乖阴阳之气”、“伤天地之和”，跟今天说的违反人性的意思差不多。当然，儒家经典中也明确说过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。但此所谓“人”，乃指男性尤其是男性统治阶层而言，是不把弱女子包括在内的。归有光提出女子于未婚夫死后可以嫁人的主张，是在为弱女子说话，是在为弱女子争权利。其历史进步意义自不待言。

文章的末段还说：

或曰：“以励世，可也。”夫先王之礼不足以励世，必如是而后可以励世也乎！

这几句话表现了归有光对于维护封建礼教的断然拒绝的立场。他是有的放矢地采取这一立场的（《明史·列女传》三卷，内记守节、殉节的未嫁女子15人，另有举行“冲喜婚”后随即守节、殉节的女子2人。实际人数当不止于此）。

他又在《答唐虔伯书》中说：

天地正义，沦没几尽，仅仅见于妇女之间。吾辈宜培植之，使之昌大；不宜沮抑之，使之销铄；此等关系世道不浅。

今天看来，这几句话没有什么显眼之处。而在信奉孔子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为真理的旧时代，要提出公然与孔子的观点相对立的主张，是并不那么简单容易的。这样看来，归有光也可算是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思想吧。

三

作为一位文学家，归有光的文学思想很值得加以探究。可惜的是，他没有留下一篇完整的理论文章，只有一些零碎的论述。

先看他对传统文学诗文的认识。

今先生率口而言，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，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。……古今人情无不同，而独于诗有异乎？夫诗者，出于情而已矣（《沈次谷先生诗序》）。

予谓文者道事实而已。其义可述，而言足以为教，是以君子志之（《孙君六十寿序》）。

认为诗出于情、文道事实，这反映的是儒家所谓诗言志、

文记事的传统观点，毋庸赘述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：他认为“率口而言”的“悯时忧世”的诗歌，应该为“大雅君子之所不废”。这表明：他对于民俗歌谣，是采取肯定与欣赏的态度的，跟一味排斥民俗歌谣的迂夫子颇不一样。

再看他对文质问题的看法。对这个问题，孔子有过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的论述，一向是被视为经典的。他在《庄氏二子字说》中，也曾涉及到此一问题：

文太美则饰，太华则浮。浮饰相与，敝之极也。

……欲文之美，莫若德之实；欲文之华，莫若德之诚；

以文为文，莫若以质为文：质之所为生文者无尽也。

孔子强调“文质彬彬”，同时提出要防止“文胜质”与“质胜文”的情况的出现，原本是对如何才能成为君子而言的，后人则把它移用于对形式与内容（包括文学艺术）关系的解释。当然，孔子在别的场合，也曾一面宣扬“有德者必有言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的说教，一面赞同“辞达而已矣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的观点。这两者似不相容，后代文人谈及此一问题时，往往各执一端，为己所用（参见拙作《孔子文质观评议》，《东岳论丛》1986年第4期）。归有光强调“质可生文”。其观点可以说是源于孔子的“有德者必有言”的。但当其接触到一些具体的文学技巧时，则又在沿着“辞达而已矣”的路线发展了：

尽有一篇好者，却排几句俗语在前，便触忤人。

如好眉目又着些疮痍，可恶。

文字愈佳，愿益为之。此乘禅也，毋更令为外道所胜。幸甚幸甚。王司马云：“如上甑馒头，一时要发乃佳。”

文字大意不失，而辞欠妥耳。然可恶者，俗吏俗师俗题，见之令人不乐也（并见《与沈敬甫》）。

孔子只说了个“辞达”，归有光似乎有意要在“辞达”上作些文章。这篇文章要是认真地作下去，倒是有益的。可惜归有光依然说得模糊笼统，难以令人满意。

值得一说的，倒是归有光对当时活跃于文坛上的复古拟古派的态度。说到明代中叶前、后七子的复古拟古，其根源应追溯至明初。明初文坛承宋、元之弊，其局面颇不乐观。对此，宋濂曾发表过如下议论：

呜呼！近代之文，予见之夥矣。大风扬沙，而五色为之昏昧；繁音嘈杂，而五声为之失伦。……此无他，无真实之功，求卤莽之效。西抹东涂，莫寻统绪；左剽右窃，仅成简编。辄号诸人曰：“我知文，我知文！”人以艰深文浅近者示之，则又曰：“此亦古文耳，何其畅达而无碍也！”是皆无真见，以人舌为之目，故颯然而无愧怍（《丹崖集序》，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卷二）。

宋濂对上述文风的不满，代表了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。于是，变革文风的问题摆到了文人的面前。变革的出路有二：一为创新，一为复古。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，前、后

七子相继提出了复古拟古的主张。前七子的重要领袖李梦阳(1473—1530)“卓然以复古自命。……倡言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,非是者弗道。”(《明史·文苑二·李梦阳传》)后七子的领袖之一李攀龙(1514—1570)亦步亦趋,“其持论谓文自西京、诗自天宝而下,俱无足观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。……其为诗务以声调胜。所拟乐府,或更古数字为己作;文则聱牙戟口,读者至不能终篇。”(《明史·文苑三·李攀龙传》)后七子的另一领袖王世贞(1526—1590)也主张“文必西汉,诗必盛唐,大历以后书勿读”(《明史·文苑三·王世贞传》)。并进一步论证说:

西京之文实;东京之文弱,犹未离实也。六朝之文浮,离实矣。唐之文庸,犹未离浮也。宋之文陋,离浮矣,愈下矣。元无文(王世贞:《艺苑卮言》卷三)。

前后七子文宗秦汉,诗尚盛唐;对东汉以后的文、盛唐以后的诗,采取一笔抹煞,一概骂倒的态度,这显然是错误的。而在当时,“七才子之名播天下,……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”(《明史·文苑三·李攀龙传》),势头却也颇为吓人。

就在这种情况下,作为一个“荒江老儒”,归有光站出来给后七子的领袖以猛烈抨击:

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。未始为古人之学,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,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。韩文公云:“李、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,那用故谤伤。蚍蜉撼大树,可笑不自量!”文章至

于宋、元诸名家，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；而世直以蚍蜉撼之，可悲也。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（《项思尧文集序》）！

所谓“一二妄庸人”，指的即是后七子的首领李攀龙和王世贞。这种猛烈抨击，对复古派无异当头棒喝。对此一事件，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钱谦益（1582—1664），曾经作过如下的记载与评述：

当是时，王弇州（即王世贞）踵二李之后，主盟文坛，声华烜赫，奔走四海。熙甫一老举子，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，树牙颊相撑拄不少下。尝为人文序，诋排俗学，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。弇州闻之曰：“妄诚有之，庸则未敢闻命。”熙甫曰：“唯妄故庸，未有妄而不庸者也。”弇州晚岁赞熙甫画像曰：“千载有公，继韩、欧阳，余岂异趋，久而自伤。”识者谓先生之文至是始论定，而弇州之迟暮自悔，为不可及也（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中《震川先生归有光》）。

钱谦益记下的王世贞对此的反应，应当是可信的。王世贞的反应正好证明：归有光所作的对复古派的抨击是正确的。此后，公安派继起抨击，终于使复古派不得不偃旗息鼓了。

归有光为什么能独具慧眼，识别复古、拟古派的错误呢？这和他曾下大力气研究过古代散文的发展历史，总结过古代散文的创作经验，是大有关系的。

四

在明代文坛上,归有光是唐宋派的一员主将。他的散文创作,远承《史记》,近学韩、欧。他曾多次表示对《史记》的景仰之情:说自己“性独好《史记》”(《五岳山人前集序》);说“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”(《陶庵记》);甚至曾得意地声称:

自以为得龙门(代指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)家法,
可与知者道也(《与王子敬》)。

谈及文学创作的甘苦时,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,曾经慨叹道:

文字难作。每一篇出,人辄异论,惟吾党二三子
解意耳。世无韩、欧二公,当从何处言之。(《与沈敬甫》)!

他对韩愈、欧阳修的由衷敬佩之情,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。

龙门家法与韩欧神理,是归有光学习和追求的两大目标。他特别重视学习龙门家法与韩欧神理,是通过总结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。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,原本是源远流长。从宏观上看,在明代以前,散文创作有两个繁荣时期:一个是先秦、两汉时期,一个是唐宋时期,而后者又超过了前者。在先秦、两汉时期,孟

庄荀韩，作家辈出；而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，当推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。《史记》是一部历史巨著，也是一部文学巨著。司马迁花费毕生精力写成《史记》，不只实现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，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引）的愿望，也把他从前代和当代散文名家那里学来的创作技巧，全部熔铸于其中，而且作出了自己的光辉创造。正因为这样，他赢得了后人的巨大尊敬和崇高评价。唐朝的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时，原是主张广泛地学习先秦、两汉的优秀散文的。他通过比较注意到：“汉朝人莫不能为文”（《答刘正夫书》，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卷三）；又注意到：“汉之时，司马迁、相如、扬雄，最其善鸣者也。”（《送孟东野序》，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卷四）柳宗元也作过这方面的比较：“文之近古而尤壮丽，莫若汉之西京。……殷、周以前，其文简而野；魏晋以降，则荡而靡；得其中者汉氏。汉氏之东，则既衰矣。”（《柳宗直西汉文类序》，《柳宗元集》卷二十一）此外，韩愈与柳宗元，都曾将对方比作过司马迁。柳宗元生前，在对人谈及韩愈的文学成就时，毫不含糊地说：“迁与退之，固相上下。”（《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》，《柳宗元集》卷三十四）柳宗元死后，韩愈评价柳宗元的文学风格，使用的是“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”（刘禹锡：《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》引；《新唐书·柳宗元传》亦引）一语。韩、柳的上述看法，对于归有光认识古代散文，显然是有积极影响的。后来，清初的方苞声明“《史记》为古文正宗”（《古文约选序例》，《望溪先生集·集外文》卷四），则把这种看法表达得更加明确了。

唐宋时期的散文家中，以八大家为最有名。而八大